



《时代》传递反法西斯胜利捷报

口述 抗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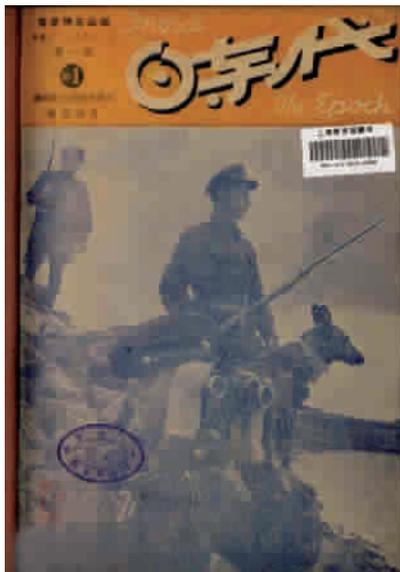
盛草婴 浙江人(1923—)。抗战期间在上海“孤岛”担任《时代》杂志编辑。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著名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的时候,我才14岁,来到上海,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既是中国跟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异常生死搏斗,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针锋相对宣传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进攻,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规模扩大了,东方跟西方两个战场,相互之间就联合起来了。上海被日本占领之后,几个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而苏德战争发生以后,苏联跟希特勒德国在上海就展开了一场非常尖锐激烈的斗争:希特勒方面在上海利用跟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侵略性欺骗性的宣传活动,他们在上海办了电台,在上海出版了远东画报还有其他一些法西斯的刊物。针对法西斯的宣传,苏联方面当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1941年8月份,就是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就在上海办起了一本杂志《时代》。

《时代》杂志主要就是根据苏联方面的电讯来报道苏德战争的情况,反映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除此以外,还在上海办起了苏联呼声电台。实际上就是德国与苏联,针锋相对地唱对台戏,希特勒德国总是千方百计要宣传他们怎么取得了胜利,而苏联方面



■ 抗战后期在上海出版的《时代》《苏联文艺》等进步杂志,及时传递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消息,极大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 图 TP

呢,要宣传他们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这方面的宣传实际上是限于上海一个地方,而是对整个中国所有的地区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底下,已经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对抗战胜利的前途,有时候信心不是太多,等到希特勒侵略了苏联,大家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谓变化,就是日本跟希特勒,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们是法西斯的一方,跟世界广大的人民处于对立的状态。

课余翻译电讯稿

《时代》杂志是由苏联的塔斯社跟上海的姜椿芳同志他们一起办起来的,先是周刊,大量刊登电讯稿消息、战地通讯,还有不少短篇小说。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当时18岁,还在中学念书,已经念过俄语能够做一点翻译工作。姜椿芳同志就代表《时代》社向我提出能不能帮助《时代》杂志分译一些稿件,我白天在中学念书,晚上跟星期天就参加《时代》杂志的翻译。

当时不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在



沦陷给日本人的地区,还是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占领的地区,大家对《时代》杂志,跟《时代》杂志社所出的刊物电讯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更多地了解苏德战线前线的情况,所以《时代》杂志在上海出版之后,就流传到全国各地去了,向广大的中国人民报道了整个法西斯斗争正确的情况和胜利的形势,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因为大家都看到,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命运是共通的。

当时,日本一方面跟苏联还维持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希特勒的盟国,因此,日本是非常痛恨苏联在上海宣传反法西斯斗争,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直接跟苏联撕破脸。所以在上海我们就利用这么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形势来开展工作。

与日本宪兵周旋

日本人千方百计想破坏我们的工作,想迫害几个主要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当年负责上海塔斯社的社长叫罗国福(音),这个人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精通中

文也翻译过鲁迅的作品,工作能力比较强的,结果日本人特别恨他,大概在1942年还是1943年,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靠近黄陂路那个地方,当罗国福的汽车经过,日本人就派了朝鲜的刺客去暗杀,向他的汽车开了几枪,罗国福的汽车逃掉了,没有被打中。除此以外,日本人还写恐吓信、打电话威胁罗国福跟其他的人。

我们出版《时代》杂志跟《苏联文艺》等其他一些杂志,日本人也经常找麻烦。《时代》杂志挂名的发行人是一个苏联人叫扎凯莫(音),实际上这个人并不管太多的事情,事情还是由姜椿芳负责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常叫扎凯莫去谈话,说你们杂志里边发表的哪篇文章,哪个报道不对头,狠狠地要批判他,这个扎凯莫他自己本身各方面水平不怎么样,姜椿芳作为沟通翻译的译员,跟着他去,实际上都是姜椿芳直接跟日本宪兵打交道,他表面上是给扎凯莫做翻译,实际上好多都是自己的话,不是扎凯莫的话,这样一来日本人几次交涉都没有取得成功,也更为气恼了,对于在里边工作的人员也常常进行盯梢、跟踪。

我在《时代》杂志、塔斯社工作,主要是做翻译,翻译苏德战讯,翻译他们的战地特写,也翻译了一些苏联的小说、诗歌。我们在上海的人当时感觉不到怎样,后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从解放区、从大后方来了好多朋友,他们说你们出的那些杂志和播的广播,对我们的作用很大,看了你们的刊物,了解了正确的战争形势,增加了信心。

从14岁到22岁,这八年是奠定我整个人生的人生观、世界观,日本军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种种的暴行,给我年轻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逐渐培养出大爱大恨。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一想中国的几亿人民究竟愿意怎么样?凡是对几亿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应该尽量多做,对几亿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根据杨克林、孙金媛1994年4月2日上海采访录音整理)

变幻手法巧拖延 机智侦破敌电台

薛鲁光

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

我的父亲薛近 1938年参加革命,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战士,他生前说与我们子女听的抗日故事,我至今难忘。

解危发报歼顽敌

父亲 1921年出生于山东蒙阴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好读,倾向进步。1938年8月他就读的泰安一中遭日军轰炸,17岁的他当即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部队首长见他文化,又聪明干练,便培养他参加野战部队电讯班,学习收发电报。由于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分割封锁、围攻堵截,战区情势瞬息万变,无线电台是当时部队最主要的通讯工具。只在电讯班学了两周的父亲被分配到某野战营部队担任报务员。

1939年1月,王营长带领一支小分队去一个高地执行侦察任务,父亲背电台紧随。因为刚截获敌人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发回师部首长。然而,电台不响了,估计被日军炸弹震坏了。怎么办?王营长急得团团转,命令父亲无论如何要修好电台。然而

两个月的集训,就简单学了点收发电报,哪会修理啊?可想到这份情报是用两位战友的生命换来的,“我一定要想法修好”。父亲冷静沉着,试着小心拆开电磁板、绕线圈,仔细回忆在电讯班时学到的每个技术要领。经焊断线、换电磁等一点点捣鼓,嗨,有声音了!但信号太弱,还是发不了电文,怎么办?爱动脑筋的父亲提着报话机“嗖嗖”地往山顶跑,一口气跑了近一个小时才接近山顶,在树丛间架起天线。果然信号强多了,嘟嘟嘟的发报声又清晰又有力量,接到小分队情报,指挥部及时调整部署,为胜利歼灭日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此,部队为父亲荣记二等功并火线入党。

机智侦破日间谍

1940年隆冬的一天,山东巨野气温下降至零下5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在温暖的被子里早已酣然入梦。此时,父亲和战友们正在野战军某机房里,忙碌地收发各种电报。

邻近台战友小敏,正在向军区发一份350组字特急机密电报,电报刚发到第10组字时,对方电台要求发快些。这个战友是新报务员,为了发快电报急得脸红脖子粗,父亲见此,接过他手中的电键准备代他拍

发电报,当父亲戴上耳机听到对方电台声音后,发觉和往常军区电台声音不一样,立即发了一句无线电暗语询问,对方电台却毫无反应,父亲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台长。

台长意识到一定是敌电台,命令父亲用假电报继续发报迷惑敌人,并立即报告巨野公安局。当父亲将电报发到37组字时,敌电台再次要求快发,狡猾的敌人却关上发报抄收电报,敌电台电波也随之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公安局无法测定到敌台方位。为了配合公安部门侦破,父亲在发报过程中不断地变换各种手法,时而快发“频率有变”,时而慢发“蜻蜓点水”,增加敌人抄收电报的难度,敌电台不得已只好长时间打开发报机抄收电报。敌人在抄收电报时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发,有时一组字码要重发几遍。父亲用这种方法迷惑敌人,拖延时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电报刚发到180组字,电讯组已测定到敌人无线电台方位在菏泽郊区,要求父亲继续发报迷惑敌人。公安局出动数十辆摩托车,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积极的配合下很快将日寇间谍一举抓获。

双枪突破敌重围

1941年5月,我曾祖父去世,经批准,

父亲前往老家奔丧。由于当时战事恶化,完事后已无法返回部队。无奈之下,父亲即转为地方参加抗日工作。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训练武装力量,团结带领家乡人民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艰苦岁月磨练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增强了他对敌斗争的才干,组织上经过考验,再次批准他入党。职务从县大队长、区武装部长、到蒙阴县县长、区组织部长等职。

那年,他担任区武装部长。腰挎双枪,且枪法奇准,多次组织炸毁伪炮楼、伏击敌伪军,有力配合了我山东省委对敌斗争的部署。有一次,父亲在沂南组织干部开会,由于汉奸出卖,拂晓前,一百多鬼子包围了沂南,闻讯后,父亲当即中止会议,拔出双枪,说一声:“分头突围,冲出去。”于是,冒着呼啸而至的子弹,父亲率领着部分战友,忽而钻高粱地、忽而爬陡坡、仗着对地形熟悉和夜幕的掩护,竟奇迹般冲出了敌人包围圈。

解放后,当年的战友、上海粮食局副局长包培发以及粮食局组织部长张桂芳与父亲一起回忆起那次奇遇,连连直呼“真危险”,在我看来,这当然有幸成分,然而,更是靠了父亲对革命的忠诚与勇敢。